



总策划 张余胜

清帝国与东亚



丛书主编 余太山

〔日〕堀敏一 著 韩昇 刘建英 编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隋唐帝国与东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帝国与东亚/(日)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
编译. —增订本.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4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527-3

I. ①隋… II. ①堀… ②韩… ③刘… III. ①中
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研究—隋唐时代
IV. ①D8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903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隋唐帝国与东亚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日]堀敏一 著 韩 昇 刘建英 编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527-3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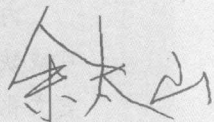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导读 (韩昇)

2007年夏天,堀敏一先生突然去世了,走得非常突然。一周前,我刚刚收到他的来信,想来他给我寄信之后旋即去世,我手边的这封信也许是他人生的绝响,唏嘘不已。

堀敏一治学极其勤奋,早年出版了《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和《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构成了他研究中国魏晋隋唐史的体系,亦即从国家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控制切入,逐步拓展开来,研究国家对社会,进而发展到对个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其目的在于实证性地揭示中国魏晋隋唐社会的性质及其存在形态。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研究隋唐帝国在世界的存在形式,及其建构的东亚世界的内在关系。所以,对东亚世界的研究构成了堀敏一史学的重要一翼。如此大视野的深入研究,使得堀敏一成为日本战后研究中国隋唐史的领军人物之一。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首先当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两所日本最早建立的近代学制的大学,从一开始就网罗了一批著名学者,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

础；此后，各自的学统薪火相传，直至现在。堀敏一毕业于东京大学，师承山本达郎与和田清，毕业后到明治大学任教。我在1991年曾经在明治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当时，明治大学的中国史研究有堀敏一和神田信夫两位著名的学者撑起大梁，在东京却也令人刮目相看。不久，他们两位都退休了，气贺泽保规从地方大学转入明治大学，接堀敏一的教席，在东京引起不小的震动，大家也只能期盼明治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能够赓续下去。堀敏一本人则在退休后，笔耕不辍，不断推出新著，继续给明治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以强有力的支持。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就是《东亚世界的历史》，由此可知他对东亚世界的重视。

因为写作的关系，他把家从东京郊外搬到了市内文京区，为的是靠近日本著名的汉籍收藏与研究机构东洋文库，方便查阅资料。他走的那一天，依然埋头写作，临时想起要查一条材料，便到附近书店翻书。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体力不支倒下，送到医院抢救，已是回天无术。从考入东京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以来，他就一直坚守这片领域，站在学术前沿。他倒在学术的阵地上，用手中如椽之笔，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他这一走，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日本战后代的中国史研究的落幕；对于明治大学而言，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曾经为霞满天的壮丽成为追忆，触目可见的凋零，令人唏嘘不已。

二

堀敏一，1924年出生于日本风景秀丽的静冈县。他上小学那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件”。在血腥残忍的战争年代里，他度过了求学的青春岁月。经历过战争的劫难和战败的彷徨，目睹了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作为战后第一代史学家，堀先生奋起于清算帝国主义史学的第一线，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因为此，他始终坚持以联系的观点，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局，去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批判了中国社会停滞论，撰写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等鸿篇巨制，给日本史学界以莫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堀先生也反对抹杀东亚社会的特点，认为东亚世界存在着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并以此影响和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广阔的视野，宏大的规模，对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精确把握,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动态性缜密研究,无不表现出其史学研究的特色。

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汉文根基甚好,对中国古代文献读解无碍,并不靠字典来揣摩文意。日本在江户幕府时代实行“锁国”政策,力避与西方的往来,却致力于消化中国文化,故形成了又一次影响深远的汉学高峰。承此汉学余绪,明治维新以后全面采纳西学规范的历史学,其骨子里依然是汉学和清朝考据学的传统,非常注重汉文的解读,文献功底相当扎实;同时又采纳西学的优点,成功地将东方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规范结合在一起。东方传统的文献学修养,大概赓续至堀敏一这一代学者,他们自幼诵读古书的汉文教育方式,同新式语文教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另外一个特点,来自他们自身的经历。这一代学者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他们也曾经狂热并支持战争。日本投降后,他们开始对这场给世界带来巨大浩劫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同时,也对战前服务于侵略战争的皇国史观及其历史教育进行清算。这段经历给他们的历史研究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表现为注重把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致力于揭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特点,力图站在民主和平等的立场上重建史学。因此,其历史研究具有批判的锋芒和思考的深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十分注意发现东方社会的特点。这一点又使得他们改变了战前“脱亚入欧”的思维方式,能够平等地看待亚洲国家,用谦虚的态度比较客观地研究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也是战后日本历史学研究能够取得显著进展的根源。因为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自视为亚洲强国,视亚洲为停滞落后的地区,同“发展”“先进”的日本成为对照,故日本一方面要“脱亚入欧”,另一方面则要统治亚洲。这种自我美化的理论,同皇国史观相结合,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基础。由此可知,1945年以前的日本史学界,对亚洲抱持歧视的立场。日本投降以后,这种人为编造出来的史观受到批判,日本学术界重新认识亚洲、回归亚洲,努力去揭示亚洲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诸多研究中,作为一种有系统的亚洲认识论提出来并形成重大

影响的,首先要提的是西岛定生《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1]后来,西岛定生对其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论证和阐述,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和《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东大出版会,1985年),给日本战后的东亚研究很大的影响,日本学界称之为“册封体制论”。^[2]

西岛定生认为,东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完整的文明区域。这个古代文明以中国为中心,其最重要的内在纽带与特征表现为汉字、儒学、佛教与律令制度。中国周围的东亚国家,受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强烈影响而积极吸取中国文化,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基础,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朝鲜、日本和越南。中国古代帝国通过“册封体制”建立起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形成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而成为这一文明区的领袖。

从西岛定生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是东亚是一个自律的、内在联系紧密的文明区域,同西方文明并立,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则和历史连续性,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明发展的模式进行解释。因此,他的东亚理论对于战后日本重新认识亚洲,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我的理解,在西岛定生的东亚理论中,册封关系只是联系亚洲各国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然而,由于他本人相当强调“册封关系”,更多的学者也围绕着这一联系形式展开讨论,所以,西岛定生的东亚理论很快就被命名为“册封体制论”,他本人也使用这一称呼,并乐于接受。其实,这种标签式的命名是颇具危险的简单化做法,也是一种误读,只是日本史学界关于东亚世界的讨论却沿着这条思路展开。最先提出质疑的就是堀敏一。^[3]他在西岛定生的观点提出来后,旋做出回应,指出册封不足以涵盖中国古代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形式,册封所反映的更多是刚性的实力运用,而中国古代帝国似乎更强调柔性地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例如唐帝国主要运用的是“羁縻”手段,

[1]西岛定生《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载于《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古代2》,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62年。

[2]西岛定生去世之后,其门人将其关于东亚世界的论文整理汇编为《西々々東アジア史観集》(第3、第4卷),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

[3]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史への提言》,载于《歴史学研究》276号,日本东京,1963年。

充分尊重当地民族自治,积极向外输出文化和制度以影响对方,柔软地应对各不相同的国家关系。堀敏一的意见也获得了积极的响应,日本史学界称之为“羁縻体制论”。

堀敏一的“羁縻体制论”是在同西岛定生的讨论中发展起来的。此后,堀敏一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东亚世界,撰写了《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岩波书店,1993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和《东亚世界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等专著,从多个角度探讨古代东亚世界的国家间关系和内在联系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东亚理论。日本史学界也往往把堀敏一同西岛定生对立起来加以介绍,甚至讨论起他们的优劣长短。然而,这些讨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堀敏一和西岛定生都认为古代东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没有分歧,所以就没有争论,人们也就忽视了它。

在认同古代东亚世界的前提下,堀敏一对西岛定生的批评集中在唐朝同东亚各国关系的形式上,而不是关系的本质方面。也就是说,堀敏一实际上是支持西岛定生的古代东亚世界说的,他也认为古代东亚是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纽带内在紧密联系的世界,只是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册封只是强调上下君臣关系,属于刚性的表现;而羁縻等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国的尊重,属于柔性的表现。由于各个时期中国同周邻国家的实力对比不同,故他们的关系并不都是上下君臣关系,也有兄弟关系、甥舅关系,还有向周邻强国纳贡甚至称臣的关系。这确实无法用一种形式去概括。堀敏一强调的是形式的多样性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柔软性,这两点是对东亚世界理论的重大发展。正是这种多样性和柔软性,大大增强了东亚世界的内在联系及其形成的向心力,从而使其具有了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堀敏一和西岛定生的理论是互补的,他们共同奠定了日本战后东亚世界理论的基础。

堀敏一一直在思考古代东亚世界问题,除了东亚世界内部的关系形式之外,他也在反复思考东亚文明的范围。按照西岛定生的见解,符合汉字、儒学、佛教和律令制度这四大共同要素的国家,包括朝鲜半岛国家、日本和越南等。我们在讨论东亚世界时,尤其在研究迄于唐代的东亚时,基

本限于此范围。而且,由于古代越南同东北亚之间缺乏广泛的交往,所以,古代东亚世界的研究更集中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范围内。这几乎已经成为史学界不言而喻的共识了。然而,进一步探究的话,其不合理之处很容易就显现出来。

对于中国古代帝国而言,对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者都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国家的对外注意力自然集中于此方向,不但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甚至在经济和文化的开拓方面,北方和西方都基本居于主要地位。太远的历史不去追溯,就以汉武帝通西域以来而言,以“丝绸之路”为象征的东西文化交流,对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时候,对北方和西方的考虑也居于主导地位,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处于次要地位。有鉴于此,则把中朝日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区域,显然是很有问题的。堀敏一在《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一书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但没有作深入的讨论。到了晚年,他将此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深入思考,提出古代东亚世界的范围必须包括同汉唐帝国有着重要关系的民族、国家及地区,不但要将北方、西方包括进来,还必须纳入东亚南,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东亚世界。在这当中,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交往的形式也不一样,故东亚世界的关系形式就更加显现出多样性来。然而,各种关系形式之间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堀敏一的构思是宏大的,符合历史事实,国际学术界也有此认识。以中国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太山教授创办的《欧亚学刊》,就把中亚和东亚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之内。有学者质疑堀敏一此见解在学术上的可行性。诚然,每一个研究者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博与精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但是,可行性与理论的正确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研究者难于进行就抹杀理论的正确性。就具体研究而言,每一位研究者依然本着自己的专长展开研究,但是,全局性的知识和宏观视野却不可少。

堀敏一晚年的上述见解非常重要,他在陈述己见的同时,也对海内外诸家之说作了介绍,并且加以评论,作为他最后一部著作《东亚世界的历史》(讲谈社,2008年)的绪论。这篇文章十分重要,所以,本书特地将它翻译出来,作为本书绪论的第一部分,同时将他以前对于东亚世界的总体论

述作为绪论的第二部分。对读这两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对东亚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可以了解日本学术界对于东亚世界研究的现状。

三

本书是堀敏一论古代东亚的学术论文的选编,以日本研文社 1998 年出版的《东亚世界中的古代日本》为基础,再选译其重要的古代东亚世界研究论文,由我编为一册。选文目录获得了堀敏一本人的认同,他还为此书撰写了中译本前言,并亲自与原出版社洽商,授权在中国出版。此后,我又根据堀敏一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本书作了增译,同时对原翻译作了订正,呈献给读者。

本书由《绪论——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结构》、《上篇——隋唐帝国与东亚》和《下篇——东亚世界的人口流动与制度文化的传播》组成。《绪论》介绍日本关于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理论及其观点,前面已经作了介绍;《上篇》具体探讨隋唐帝国与东亚关系的变迁,阐述该时期东亚世界国际政治关系的确立以及国际交往的性质与特点;《下篇》则研究东亚世界中的人口流动、律令制度的传播和在唐新罗人对东亚交通的贡献这样三个个案。全书由表及里,从对东亚世界的全局性把握到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间政治秩序的形成,进而深入到东亚世界内部,对一些不一定显眼却至关重要的个案进行讨论,使人们对东亚世界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丰富。也就是说,全书采取由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关系到具体的社会、制度、文化关系,层层深入的结构安排。

《上篇》由 4 章组成:(1)隋代东亚的国际关系;(2)唐初的日唐关系与东亚国际局势;(3)日本与隋唐王朝间的国书;(4)渤海与日本之间的国书。

自从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的东亚国际政治中心的权威地位逐步丧失,到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原的汉族王朝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过去受压抑的胡族,以往以汉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关系秩序崩溃了。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周边民族的独立,例如在朝鲜半岛,韩族攻陷魏晋王朝在当地的郡县,建立起了各自独立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而日本大约也在此时完成了由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演变,基本实现了国内统一;另一方

面,政治权力中心的丧失,也导致了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的竞争,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和唯权力崇拜。

隋朝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内分裂状态,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继隋而起的唐朝,更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物质与精神文明均达到鼎盛。隋唐帝国的繁荣,不是由中国孤立地实现的,以隋唐为主导的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各民族、地区、国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源源涌入,是实现唐朝盛世的基本因素。因此,重建以隋唐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便成为保持国际交往与繁荣的前提,为此,隋唐两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篇前两章,就是对这种努力的具体阐述,说明不同于汉朝的新的东亚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在东亚,隋唐帝国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所面临的一大阻力,来自高句丽王国。高句丽崛起于晋末,因鲜卑族进入中原造成其对东北地区控制力下降的形势,遂向西扩张,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区域。由于高句丽地区曾经有四百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的郡县,中国文化的根基很深,水平也很高,中国人对其有很深的亲切感。高句丽向西扩张的势头虽然在北魏时被遏制住了,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关系,高句丽同中国国内政治势力有着颇深的关系,例如在北周武帝统一华北的时候,高句丽就直接出兵支持北齐残余势力高宝宁对抗北周。需要注意的是北周武帝旋去世,不久,北周政权被隋朝所取代。时隔不远,高句丽对于中国政局的潜在影响,一定会给隋朝当局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高句丽在国际上公然抗拒隋唐王朝,将使得隋唐两代建立国际政治关系秩序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朝鲜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际安全环境的建立,无论哪个方面,对于隋唐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更何况隋唐两代的皇帝都雄心勃勃,充满自负。因此,朝鲜问题必须置于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而这是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作者前两章用颇长篇幅论述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形成的过程,有着很深的道理。

那么,隋唐两代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种关系具有规范性的表现,就是国家间交换的国书。因此,国书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是枝节末叶的考证。作者为此用了两章的篇幅,比